

张国焘曾宣布“开除”和“通缉”中共四大领袖

1935年9月中旬,张国焘趁四方面军完全集结在阿坝之际,迫不及待召开所谓“川康省委扩大会议”。会场设在格尔登寺大殿内,经过了精心布置。会场旁边一个戏台上扯着一条醒目的横幅,上面写着“反对毛、张、周、博向北逃跑”。

在会上,张国焘大声“声讨”：“同志们,今天的会,大家一看标语就明白了。10日凌晨,右路军发生了令人愤慨的不幸事件,毛泽东、张闻天、周恩来、博古等人私自率领一、三军团向北行动,破坏了中央和红军的一致行动。他们开溜时既不报告,也不交防,导致敌人乘虚而入,我红三十团遭到重大伤亡!”

“他们为什么要开溜呢?”张国焘自问自答,“因为他们害怕敌人,要逃跑。他们说北上抗日只是借口,托辞、幌子,想逃跑才是真正的目的。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,北上是不行的,还是要南下,建立天(全)芦(山)雅(安)根据地,相机向四川发展。”

10月5日,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召开会议,另立“中央”,自任“临时中央主席”,宣布“开除”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博古、张闻天的党籍,并下令“通缉”。对叶剑英、杨尚昆“免职查办”。

正在此时,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(化名张浩)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,中断的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。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,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信任,称“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,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”,“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”。

1936年1月24日,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:“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、四方面军的问题,我已会见毛泽东同志,询问一、四方面军通电甚少,国际甚望与一、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。我已带密码与国际通电,兄如有电交国际,弟可代转。再者,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,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,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。”



1937年12月,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。图为出席会议的部分人员合影。左起:张闻天、康生、周恩来、凯丰、王明、毛泽东、任弼时、张国焘

张国焘得此电文后,心情是复杂的。他与毛泽东的“南下北上”之争,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。张国焘细细揣摩,建党初期,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,对于这种私交旧谊,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,无动于衷。想到此,张国焘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,分“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”,历数所谓“机会主义”的表现,将“分裂党和红军”的责任,完全推给毛泽东的“北上”路线。这封电文还是以“中央”的名义发出的,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。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:“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”,“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”。并且指示:“兄处可即成

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。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。”

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,张国焘顿感失落和无奈。可是,他仍然不甘心,又给林育英去电:“浩兄: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?”他怀疑林育英已失去自由。此时,中央政治局通过《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“中央”的决定》,指出:张国焘成立“第二党”的倾向,无异于自绝于党,自绝于中国革命,电令“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‘中央’,放弃一切反党倾向”。张国焘孤立了。

1936年5月20日,毛泽东同林育英等致电朱德、张国焘等,除告

之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,还说:“过去的分歧不必谈,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,反对日帝和蒋介石……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取协商方式。”在内外压力下,兼之大势所趋,6月6日,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“中央”。

张国焘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,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。10月,红一、二、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

1937年3月,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,会议的议程只有两项:一、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共的任务。二、张国焘的错误。

在延安开会批判张国焘时,毛泽东讲了很长的话。他特别提到:“张国焘对‘毛、周、张、博’不特笔之于书,而且用在标语、歌谣、游戏、戏剧中去。这些实际上连国民党的界限也消灭了。”

张闻天作总结发言:“这几天的讨论,已将焘路线表现的罪恶行为充分地揭发出来了。这对全党及犯此错误的人都是教育的重要工作……博古同志说得正确,他的肃反和一切别的苏区的肃反目的不同,而是保障张国焘的统治。因此才建立了他的别人调动不了的军队的办法。张国焘建立的军队正是这样的。”

张闻天还说:“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不走到党外去,变为党的叛徒,除非自己下决心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。不改正自己的错误,坚持自己的错误,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。”1935年9月的俄界会议上,张闻天曾预言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“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”,不幸而被言中。这次张闻天的预言一年后也应验了。

会议作出《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》。张国焘知道自己的处境,赶紧写了一份《我的错误》的声明,过关了事。1938年清明节,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,叛逃到了国民党方面。

(据人民网)

北洋时期“富二代”败家的那些事儿

“曹十三”倾家荡产

曹锟“小站”弃日出身,领兵拥戴袁世凯,以一莽夫从此拥兵自重,擢吴佩孚任第三师长为其羽翼,凭借所谓“直系”乃成为北方一大势力,与皖系、奉系抗衡,火并无已。其后贿选成功,刚做了不久“大总统”,被倒戈的冯玉祥囚禁于中南海延庆楼,获释之后,就此结束其一生。

此人学无术,闲时用扫帚般大笔,写其一笔到底的“虎”字,而自鸣得意。其人未受教育,对儿辈无所谓家庭教育,北洋军阀曹氏者很多,也不止他一人如此。

曹氏有两子,若以整个族中排行,长子士岳排行十一,次子士嵩排行十三。岳嵩两个名字,据说都是以他在内战时打过胜仗的地方取名纪念的。

曹士岳长得一身痴肥,体重二百几十磅,不读书,终日嬉游,驾车兜风,或就在家中地下室放枪打靶,既有老子留下偌大资产,即使是这样玩耍,还不至于尽倾所有。

曹士嵩却与其兄大异无趣。身躯小如侏儒,蓄发长可及颈,可算“披头”的先驱。他成天沉湎在舞场和赌场,交游都是年长于他的社会上各色人等。经常与其来往的,多是汽车经销商,有中国人,也有洋人,为的是窥伺他何时要换新车。

有一年,天津来了几个上海黑社会人物,在租界里经营“花会”兼贩毒品,又是赌场上的翻戏党。曹士嵩便和这伙歹徒交上了朋友,成天在家里关起大门赌扑克。

有一夜,消息外泄,先是听说其在天津英租界新忠厚里一幢洋房输掉了;俄顷又获报告第二幢也输掉了;到了半夜,第三幢又告出手。因为摒绝外人知道,亲友无法进入劝阻,这一夜连输三幢洋房!

一夕,大家在舞场舞兴方酣,忽见曹士嵩匆匆奔来,在到处找人。问他何事这样急促,他袖出钻石手镯一只,环镶九颗晶莹巨钻,谓欲限时出售,索价大洋4万元,可能有些豪客愿意承购;但夜半三更,何来如许巨额现钞?绕场一匝,难寻受主。

有人同他商洽,可否明晨银行开门付款?曹答只因今夜急

用,明日便不卖了,即使卖也不是这个价钱。结果由前述上海歹徒帮,连夜分头搜集现钞如数交易,这只钻戒乃落入此辈人手中,转售出手,获利之巨可以想见。

后来才知道曹士嵩连夜出求现钞,乃因家里赌局未散,他已输得精光,非有现钞不能翻本,才出外设法,想起只有到舞场还有人在。这种迫不及待将家当送光,好象鬼使神差!难道真是曹锟的“报应”?

曹士嵩之妻周氏,是平津有名的溜冰选手,嫁后因曹不务正业,将家产败得精光,不久和他分离。20余年前有朋友自西贡回港告我,在那边曾相遇周小姐,她在西贡广播电台担任广播员维生。她自叹说:“和曹士嵩结婚以后没有过快乐日子。两人分手时,我只拿了他一条旧领带聊作纪念,因为他确已空无所有了!”

辫帅长子最无赖

辫帅张勋的长子张景翰不愧是当时所谓“遗少”里最无赖的一个。老子遗留下的资产,已被挥霍殆尽。每年都要回江西老家去变卖田地,换得现款,便在上海、平津赌博游荡。

此人外表颇为俊俏,人很聪明,会利用他的小聪明去到处借钱乱花。

“张辫帅”生前部下僚属中尽有什么人,他脑子里存有名册,常挨家挨户编造理由去借钱,自然都是有借无还。其中不无封疆大吏与复辟遗老,这些人虽多退休休养,但那时尚是北洋残局,还有些剩余的名气和架势,年龄多在花甲古稀之间。一般人尊贤敬老,对这一辈失势的老人,表面上还加以崇敬,唯独这个张景翰如初生之犊,不管那一套,反正都是他父亲的部下,见面就伸手借钱。甚至在夜里,他治游或赌博输了要翻本的时候,就开车挨家去借。这些遗老老绅,老迈年高,习惯早睡,在热被窝里也会被吵醒,看在辫帅的生前交谊,只有稍予敷衍,多少给点了事。

他并不视这种行为为丢老子的脸,有时还拉着朋友同车去到处“拜访”,去的都是当时有名气的府第。据同行的朋友

说,他渐渐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物,吃人家闭门羹的时候多。

王三公子最阔绰

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的儿子,外号“王三公子”。此人跋一足,背地人叫他“王瘸子”。以他父亲的怪吝,就有他的豪奢,世间的事,多是如此。“王三公子”肢体虽有缺陷,当时在平津仍有很多贵妇名媛相与周旋;尤其在赌桌上出手阔绰,带来的现钞都是麦加利和汇丰银行的崭新大票,每夕总要倾囊才休。瘸子等于“散才童子”,所以到处受欢迎。

“王三公子”最爱收集各种名牌的最新照相机,家里玻璃橱摆满这一类货色;但本人并不经常拍照。家里布置得华丽舒服,却每天要上一家喧嚣的旅馆里去大抽鸦片,每出携带随从两三人,加上帮闲人物,颇为热闹。

“王三公子”一度有兴趣要学戏并登台串演,包围他的人就更多,说戏的、操琴的、配角对词儿的,另个还有几个场面的人员,每天三餐要耍乐,都由他开销。到了登台之前,轰动远近朋友,倒要看看瘸子怎么能上台演戏。

原来他定制了一双靴子,底子一高一低,保持身体平衡,以便表现“台步”,串演四郎探母中的“坐宫”,当然没有太多的动作;但高低不平的靴子,不能掩饰其怪异的“台步”,一举一动,招得哄场大笑,更因其头纱系得太紧,心里紧张,中场忽然后仰,昏倒在台上,全场哗然。结果“杨四郎”被抬了下去,幕下。这一场戏演下来,花掉“袁大头”一万余元,可谓豪举!

他的太太是平津社交界美女中有“四大金刚”之称的玉玉梅。她亭亭玉立,丰姿奇佳,说得一口流利的交际英语。他们这种不自然的结合,是久便不欢而散。玉玉梅另和一个法国医生各叫拉达斯的同居在当时天津法租界中街“义品公司大厦”的公寓里。这个法国人,大家通称他“雷大夫”,有鸦片烟瘾,据他自己说,是居住云南蒙自的时候抽上烟瘾的。他的住处公寓里,时常举行“天体舞会”,邀集中外男女,在熄灯后摸索舞伴,亦唯法国人最爱搞这一套花样。可见当时北方殖民地社会,其荒唐无耻到了什么程度。(本文原载于《文史博览》刘宗芝)